

汉代中原系刻纹铜器研究^{*}

吴小平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市 310007)

关键词: 汉代 中原 蜀郡西工 刻纹铜器

摘要: 汉代中原系刻纹铜器纹饰均以云气纹为主,或辅以三角锯齿纹,器表鎏金。其始现于西汉中期,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达到顶峰,之后衰亡。其使用对象为王侯一级。纹饰的高度一致,反映了其制作地的唯一性。据铭文可知,蜀郡西工制作此类器物,因此,推断此类刻纹铜器是蜀郡西工的产品,而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滇系刻纹铜器。

KEY WORDS: Han Dynasty Central Plains Shu Jun Xigong (Western Workshop of Shu Commandery) Engraved bronzes

ABSTRACT: The hallmark of gilded engraved bronzes produc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is the cloud-mist pattern with triangular zig-zag motifs. This type of bronzes initially appeared in the Middle Western Han period and arrived its peak during the Late Western Han and Early Eastern Han periods. Then this type of bronzes gradually faded away. Engraved bronzes were the privilege of Kings and Marquis, and their highly standardized decorations indicate that these products came from one production center. According to inscriptions, Shu Jun Xigong was the official taking charge of the production. Thu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is type of products was primarily produced by the Western Workshop of Shu Commandery and its style would trace back to the Dian style engraved bronzes.

汉代刻纹铜器除了以各种写实性动物纹为主的滇系和以复杂几何形纹饰为主的岭南系外,还有一种以云气纹为主的刻划纹饰铜器,其外表多鎏金,分布多见于中原,故称之为中原系刻纹铜器。鉴于目前尚无人进行研究,下文便试为之。

一、器类、纹饰与时代

此类刻纹铜器有博山炉、温酒樽、壶、盆、盘、碗、甑、动物模型和勺等器物构件,具体器类和纹饰如下。

1. 博山炉 1件,长沙汤家岭张端君墓出土^[1]。器身口沿刻三角折线,腹部为一周云纹,鎏金(图一 1)。

2. 温酒樽 以三角折线纹为界,盖和腹部中心纹饰为各种云气纹,其间或穿插有奇鸟怪兽等神异图案,器表鎏金。长沙 M211(图三 1)、西安芙蓉南路 M1(图三 2)、邯郸张庄桥 M1(图一,

3)^[2]、邗江姚庄 M101^[3]、扬州宝女墩 K1^[4]、长沙汤家岭张端君墓出土^[5]共 7 件。

3. 壶 以三角折线为界,颈、腹部中心位置施云气纹,通体鎏金。仅 1 件,长沙汤家岭张端君墓出土(图一 2)^[6]。

4. 盆(洗) 10 件,器形基本相同,宽平沿,弧腹,平底。有永州鹞子岭 M2 出土 2 件(图二, 1)^[7]、长沙汤家岭张端君墓^[8]、邗江姚庄 M102(图一 5)^[9]、江都凤凰河木椁墓^[10]、东海县尹湾 M4^[11]、泗阳贾家墩 M1(图二 2)^[12]、邗江姚庄 M101^[13]、仪征新集螃蟹地 M7^[14]、洛阳吉利区 C9M445(图二 3)^[15]、芜湖贺家园 M2 各出土 1 件^[16]。纹饰也一致,腹部主要为云气纹,在口沿或底部施三角折线纹。鎏金。

5. 盘 发现 2 件,沿上、腹内外、外底均刻云纹,腹内边沿刻三角折线纹。鎏金。扬州宝女墩 M104^[17]、长沙汤家岭张端君墓出土^[18](图一 6)。

6. 甑 1 件,仅巩县芝田公社出土^[19]。器身鎏金,中腹和口沿为云纹,上腹和圈足为三角折

* 本文为 2014 年浙江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国图像文化研究与国际传播”课题(2014XZA102)研究成果。

线或弧形曲线纹(图一 A)。

7. 熊 2 件, 咸阳龚家湾 M1 出土^[20]。通体鎏金, 身刻细线。

8. 羽人 2 件, 1 件出自洛阳机车工厂 C5M346^[21], 另 1 件为欧洲所藏^[22]。前者所出羽人作跪状, 器身用细线纹勾出云气纹和羽状纹, 服饰下摆刻施细密的羽状纹, 筒状物也以细线勾出三角纹和云气纹。通体鎏金。欧洲所藏为一器座, 羽人纹饰为短线表示发、体毛和羽毛。

9. 勺 1 件, 太原东太堡出土^[23]。鎏金, 勺

中心刻云气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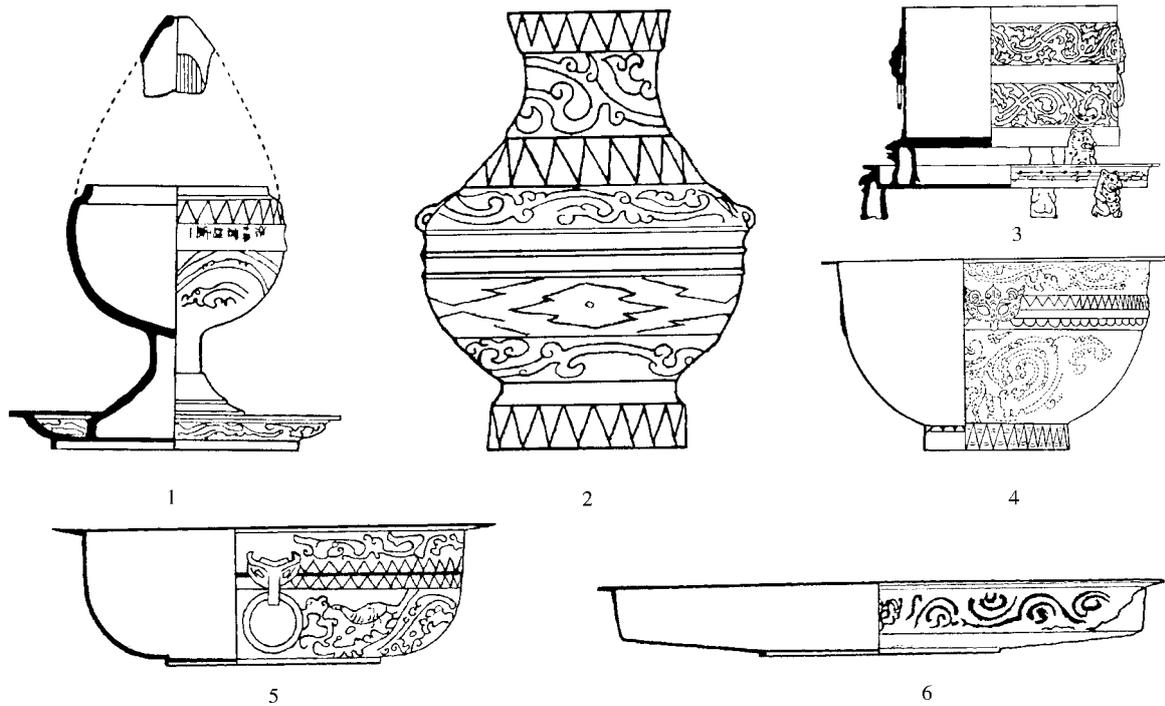
10. 车构件 多件, 均出自巨野红土山^[24]。表面皆鎏金, 线刻流云纹, 并有虎、鹿、鸟等纹样。

11. 器架 1 件, 定县北庄出土^[25]。以刀形饰两件立于两侧和山形饰一件横置其间组成。上面鎏金, 两面线刻变形云纹。

12. 碗 4 件, 邗江姚庄 M101 出土。通体鎏金, 腹、底篆刻云气纹, 或穿插奔鹿。

根据以上各类器物的出土情况, 结合其所出墓葬时代, 列表如下。

器名	出土地	纹饰内容	时代	资料出处
博山炉	长沙汤家岭	口沿刻三角折线, 腹部中心位置为云纹。鎏金	西汉晚期	《考古》1966 年第 4 期
樽	长沙 M211	以三角折线为界, 盖、腹中心施云气纹, 器表鎏金。	西汉晚期至东汉初	《长沙发掘报告》
	邗江姚庄 M101			《文物》1988 年第 2 期
	扬州宝女墩 K1			《文物》1991 年第 10 期
	长沙汤家岭			《考古》1966 年第 4 期
	邯郸张庄桥 M1			《文物》1995 年第 10 期
	西安芙蓉南路 M1			《长安汉墓》
壶	长沙汤家岭	以三角折线为界, 颈、腹中心纹饰刻云气纹。鎏金	西汉晚期	《考古》1966 年第 4 期
盆	永州鸽子岭	口沿和底刻三角折线、腹部为云气纹。鎏金	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	《考古》2001 年第 4 期
	长沙汤家岭			《考古》1966 年第 4 期
	邗江姚庄 M102			《考古》2000 年第 4 期
	江都凤凰河			《考古》1956 年第 1 期
	东海尹湾 M4			《文物》1996 年第 8 期
	泗阳贾家墩 M1			《东南文化》1988 年第 1 期
	邗江姚庄 M101			《文物》1988 年第 2 期
	仪征新集 M7			《东南文化》2009 年第 4 期
	洛阳吉利区 M445			《文物》2001 年第 10 期
	芜湖贺家园 M2			《考古学报》1983 年第 3 期
盘	扬州宝女墩 M104	沿、腹、底刻云纹, 腹内边沿刻三角折线。鎏金	西汉晚期至末期	《文物》1991 年第 10 期
	长沙汤家岭			《考古》1966 年第 4 期
甗	巩县芝田公社	口沿和中腹刻云纹, 上腹和圈足刻三角折线或弧线纹。鎏金	东汉早期	《考古》1974 年第 2 期
熊	咸阳龚家湾	通体鎏金, 身刻细线	西汉末期	《考古与文物》1987 年第 1 期
羽人	洛阳机车厂	器身刻云气纹和羽纹, 下摆刻羽状纹, 筒状物也刻三角纹和云气纹。鎏金	东汉晚期	《考古与文物》1999 年第 1 期
	欧洲所藏	短线刻画毛、羽。鎏金	西汉晚期	《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
勺	太原东太堡	云气纹。鎏金	西汉晚期	《文物》1962 年第 4、5 期
车构件	巨野红土山	云纹、并有虎、鹿、鸟纹。鎏金	西汉中期	《考古学报》1983 年第 4 期
器架	定县北庄	变形云纹。鎏金	东汉初期	《文物》1964 年第 12 期
碗	邗江姚庄 M101	通体鎏金, 腹、底篆刻云气纹, 或穿插奔鹿	西汉末期	《文物》1988 年第 2 期



图一

1. 铜博山炉(长沙汤家岭张端君墓) 2. 铜壶(长沙汤家岭张端君墓) 3. 铜温酒樽(邯郸张庄桥 M1)
4. 铜甗(巩县芝田公社) 5. 铜盆(邗江姚庄 M102) 6. 铜盘(长沙汤家岭张端君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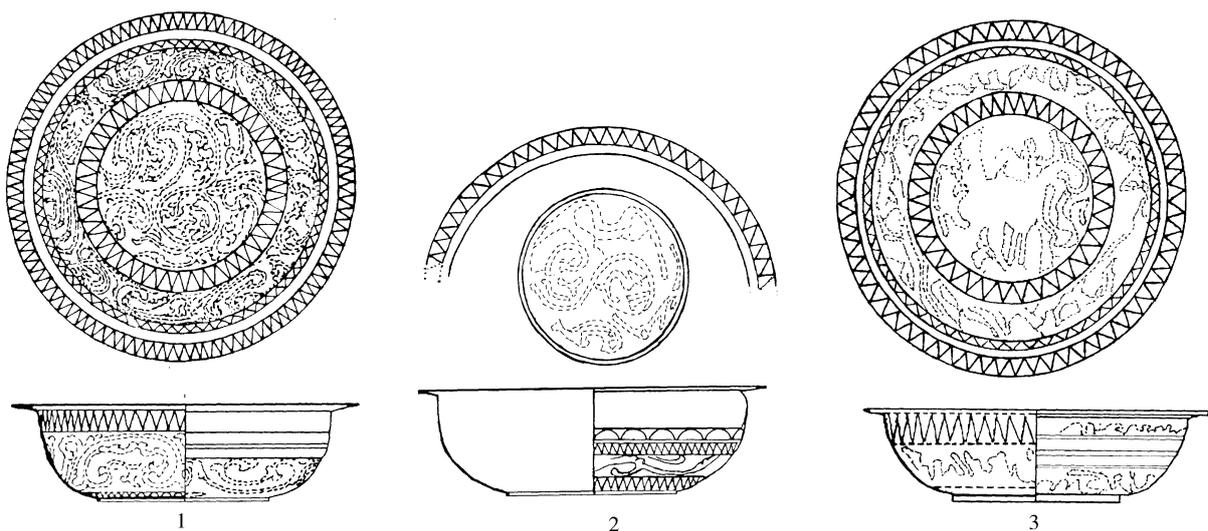
从上看,中原系刻纹铜器纹饰以云气纹为主,三角锯齿纹为辅,鎏金,与以几何形或动物纹饰为主的滇系、岭南系刻纹铜器存在较大差异。与滇系和岭南系刻纹具有较强的地域特征不同,其广泛分布于中原地区,有江苏、山东、安徽、河北、湖南、陕西、河南、河北、山西等。

从时代方面考察。中原系刻纹铜器西汉中期仅在巨野红土山汉墓一处发现,而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出现爆发性的增长,东汉中晚期急剧消亡。

从使用对象方面看。中原系刻纹铜器以云气纹为主,与以几何形或动物纹饰为主的岭南存在巨大差异,且器表多鎏金,显示此系铜器的高贵,所出墓葬也证明了这一点。

永州鹞子岭 M2 出土较多广汉郡、供工工官所造乘舆铜扣涂金漆器,墓主为泉陵侯夫妇;邗江姚庄 M102 出土广汉工官和考工所造乘舆漆器,所出虎钮琥珀印与广陵王刘荆墓所出相同, M101 所出与之接近,推测也应属王室家族;邗江杨寿乡宝女墩 M104 出土广汉工官、供工所造乘舆漆器,出土铜器近 60 件,还有玻璃衣片,其墓

主应属广陵王室成员;仪征螃蟹地墓主报告也推断为广陵王贵族成员;咸阳龚家湾 M1 出土玉衣残片,墓主属三公或九卿;太原东太堡出土铜器 20 多件,还出土玉器和马蹄金,报告推测墓主属代王王府成员;巨野红土山墓主考证为昌邑哀王刘贺;定县北庄出土黄肠石,墓主为中山简王刘焉;洛阳机车厂出土 750 片玉衣残片,墓主为王一级人员;长沙汤家岭张端君墓出土铜器 101 件,鎏金铜器达数十件,漆器中不乏鎏金铜扣、贴金箔、银扣、错金扣等,有些器物应属尚方御用,反映了墓主相当高的社会地位;邯郸张庄桥 M1 出土数万枚铜钱,洛阳吉利区 C9M445 出土铜钱近千枚,芜湖贺家园 M2 出土近千枚铜钱,漆器若干,长沙 M211 出土金饼、玉器和 2000 枚铜钱,泗阳贾家墩出土铜器近 30 件,漆器中有嵌金丝、银脱等高级器类,均反映了墓主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可知,中原系刻纹铜器的使用多见于王侯一级,而岭南系刻纹铜器则不然,墓葬中除永州鹞子岭墓主身份为王外,经蒋廷瑜考证^[26],其余可能为郡守一级官员。若此,中原系刻纹铜器的使用要比岭南系高级。



图二 铜盆

1. 永州鹞子岭 M2 2. 泗阳贾家墩 M1 3. 洛阳吉利区 M445

二、制作地及源头

中原系刻纹铜器的纹饰均为云气纹或加三角折线纹、器表鎏金，铜器纹饰的高度一致显示出其应出自同一产地。但究竟是何地制作？下面两例铜器铭文提供了线索：

《蜀郡西工铜斛》：“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闾瑰饰。铜承旋，径二尺二寸。铜涂工崇、雕工业、炼工康、造工业造，护工卒史恽、长汜、丞萌、椽巡、令史郟主。”^[27]

邯郸张庄桥 M1 所出《蜀郡西工造酒樽》：“建武廿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内者室、铜工堂、金银涂章、文工循、造工业、护工卒史口、长汜、守丞泛、椽习、令史揞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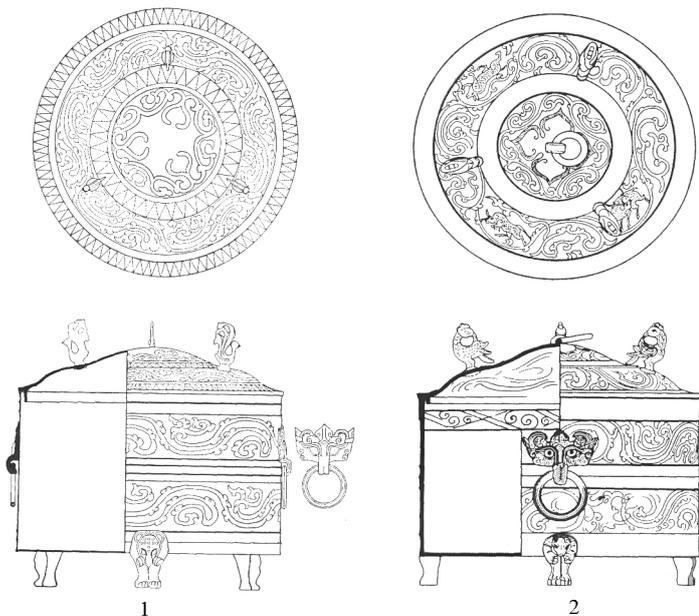
从上可知，蜀郡西工所造铜樽器表鎏金，并有雕刻纹饰，其纹饰内容如邯郸张庄桥所出前文已见，属云气纹饰。中原系其他刻纹铜器虽无铭文记载，但也均鎏金，篆刻云气纹饰。因此可以推断，中原系刻纹铜器的制作地应为蜀郡。

还有一文献可以证明。由于蜀郡所造产品极度耗费人力物力，和熹时邓太后不得不“敕止曰杀省珍费……其蜀

汉扣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28]，导致蜀郡工官手工业受到紧缩并趋于衰亡。巧合的是，中原系刻纹铜器的时代下限也基本为东汉早期，进一步论证了中原系刻纹铜器的制作中心当为蜀汉。

由于蜀郡制作的刻纹铜器属御用器具，其使用故也多限于皇室成员或高级官吏，而这些人员多居住在内地，因此中原一带多有出土。

从上可知，蜀郡西工制作刻纹铜器始于西汉



图三 铜樽

1. 长沙 M211 2. 西安芙蓉南路 M1

中期,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为高峰,东汉中期衰落。铜器铭文方面也证明了此点。

《二年酒甗》:“二年,蜀西工长儋、令史后得、畜夫中章、佐广成、工贞造。容五石,重九十五斤”其属蜀郡西工西汉早期所造,铭文中无郾鄆张庄桥所出“金银涂”、“文”、“雕”字样。《周君鉴》:“中平五年,蜀郡工官造作。周君。宜吉祥,宜王。”此器为东汉晚期蜀郡工官所造,但又有造作者的姓氏,还有常见的吉利语,它可能是由蜀郡工官监制周氏私人作坊承制^[29]。一早一晚两例蜀郡铜器的铭文中未发现文、雕等字样。

上文显示,蜀郡西工在西汉早期并不制作刻纹铜器,其西汉晚期突然出现并剧增的刻纹铜器制作技术究竟从何而来?

研究表明^[30],岭南系刻纹铜器时代与蜀郡西工所造相当,均始于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为高峰,显然其并非源头。相反,滇系刻纹铜器始于战国晚期,西汉早中期达到高峰,西汉晚期绝迹,不排除其传播的可能性。

从纹饰题材和手法方面来看,滇系刻纹铜器和蜀郡西工所造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三角折线纹、卷云纹的图案在滇、蜀两地均有发现,以折线纹作为分界和装饰的风格也一致。蜀郡西工刻纹铜器动物模型上的体毛用短线表现的手法,滇地铜器上的牛、虎、蛇、野猪、蛙上均可找到。

据此推断,蜀郡西工所造刻纹铜器技术应来源于滇地。结合滇系刻纹在西汉晚期的急剧消失和蜀郡西工刻纹铜器的爆发性增长来看,应是部分滇系刻纹铜器工匠被迁徙至蜀郡所致。至于滇系铜器工匠的外迁问题,本人已另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31]。

[1]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报告[J].考古,1966(4).

[2]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郝良真.郾鄆出土的蜀西工造铜酒樽[J].文物,1995(10).b.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长安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3]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J].文物,1988(2).

[4]扬州博物馆.邗江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J].文物,1991(10).

[5]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报告[J].考古,1966(4).

[6]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报告[J].考古,1966(4).

[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州市芝山区文物管理所.湖南永州市鹤子岭二号西汉墓[J].考古,2001(4).

[8]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报告[J].考古,1966(4).

[9]扬州市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2号汉墓[J].考古,2000(4).

[10]屠思华.江都凤凰河西汉木椁墓的清理[J].考古,1956(1).

[11]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1996(8).

[12]淮阳市博物馆.泗阳贾家墩一号墓清理报告[J].东南文化,1988(1).

[13]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J].文物,1988(2).

[14]仪征市博物馆.仪征新集螃蟹地七号汉墓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09(4).

[15]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区东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1(10).

[16]安徽省文物工作队.芜湖市贺家园西汉墓[J].考古学报,1983(3).

[17]扬州博物馆,邗江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J].文物,1991(10).

[18]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报告[J].考古,1966(4).

[19]巩县博物馆.河南巩县发现一批汉代铜器[J].考古,1974(2).

[20]孙德润,贺雅宜.龚家湾一号墓葬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7(1).

[21]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发掘的四座东汉玉衣墓[J].考古与文物,1999(1).

[22]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23]解希恭.太原东太堡出土的汉代铜器[J].文物,1962(4-5).

[24]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J].考古学报,1983(4).

[25]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定县北庄汉墓出土文物简报[J].文物,1964(12).

[26]蒋廷瑜.汉代篆刻花纹铜器研究[J].考古学报,2002(3).

[27]铭文引自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研究[M].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28]《后汉书》卷10《和熹邓皇后纪》

[29]工官监制私人作坊承制的现象在东汉晚期的铁器、漆器上较为普遍,宋治民先生对此有详细阐述,可参考宋治民.宋治民考古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65.

[30]同[26].

[31]吴小平.汉代滇系刻纹铜器研究[C]//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谭青枝)